紅軍「長征」一詞來歷

陸茂清

文史叢譚

一提及「長征」或「萬里長征」，便知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從江西瑞金出發到陝北的戰略大轉移。但紅軍在長征前動員和開始後一段時間裡，沒有叫「長征」的，總部所發的命令、訓令中，稱作「突圍」、「反攻」，又叫「西進」。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的《遵守會議決議》中，仍稱之爲「突圍行動」。從紅軍官兵的回憶文章看，也有多種說法，如「突圍行動」、「長途行軍」、「西征」、「戰略轉移」、「開闢新的根據地」等等。

「長征」一詞最早出現在半年以後的一九三五年五月間。其時主力紅軍一方面軍已進入了四川，紅軍總部以總司令朱德的名義，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布告》，抨擊四川軍閥欺壓彝族同胞，宣示紅軍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嚴明紀律。布告採用六言駢句形式，通俗簡明，琅琅上口，易記易傳，內中第一次將紅軍的戰略轉移稱作了「長征」，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軍閥，壓迫彝人太毒。苛捐雜稅重重，又復妄加殺戮。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

自從《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中首次使用「長征」後，漸次傳播並被採用，如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徐向前等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西征軍萬里長征，屢克名城，迭摧強敵。」

七月，紅軍總政治部的《紅星報》，發表了題爲《以進攻的戰鬥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陝甘新蘇區》的社論，社論中也使用了「萬里長征」一詞。

再如，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張國燾同志，對於中央紅軍在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鬥爭中，及突圍後的二萬餘里的長征中所取得的勝利估計不足出發……主張以向中國西南部的邊陲地區退卻。」

十月十九日，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吳起鎮，毛澤東在會上說：「從瑞金算起，十二個月零二天，我們走過了贛、閩、粵、湘、黔、桂、滇、川、康、甘、陝共十一個省……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里，這確實是一次遠征，一次名副其實的，前所未有的長征！」

以後「長征」頻頻出現在了毛澤東的講話、文章中，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他一連用了五個「長征」：「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麼？」毛澤東還寫過膾炙人口的七律《長征》。

「長征」成了紅軍從江西到陝北戰略大轉移的專用名詞，廣泛應用在講話、文件、文章、報紙、刊物，以及教科書中，一直延續至今。

想雪了

劉文

變天了，是記憶中要下雪的樣子，心裡便升騰起一陣渴望。

沒有雪的冬天，怎麼能叫冬天呢？

我是一個極其敏感的人，想到「雪」這個字眼，腦海中不由自主就流淌出一串關於雪的詩：

玲瓏正六小，玉碎誰作巧？
飛飛如情至，素妝舞飄渺。

盡眼無塵埃，蒼穹空淨好！

怎忍踏雪行，門前不忙掃。

「有幸對雪吟，桃紅飛冷腮。蕭蕭天涯客，乘風描素白。」太愛雪了，愛到了忘了自己，忘了自己是個怕冷的人。冷的時候，心臟會縮得很小很硬，不能呼吸！但我可以在雪裡呼吸，在雪裡欣喜！人就是這樣的，是矛盾的。恨與愛擠在一個空間的時候，仍然可以做到相安無事的和諧；畏懼與渴望相約而至時，不安分的心跳總是蠢蠢欲動！

我穿着厚厚的羽絨服，站在清冷的山尖上等，等雪的到來！想雪了！想借它眷顧這一世蕭條滋潤那一世繁華！想雪了！就像是想一個久未聯繫的朋友！

想雪了！

兩代翻譯家的遭遇

馬海甸

燈下集

我的書架上，曾置有署名齊放翻譯的劇本，如《熙德》、《昂朵馬格》（此兩劇八十年代後分別收入《高乃依戲劇選》和《拉辛戲劇選》重新出版）、《羅曼・羅蘭革命劇選》等等。買書和閱讀均在六十年代初，信息極爲匱乏，很難考證「齊放」是什麼人。不過有兩點是肯定的：第一，譯者通法語（儘管他也譯蘇聯、羅馬尼亞的作品）；第二，譯者對戲劇有偏嗜。同樣在六十年代初，我在周煦良主編的《外國文學作品選》裡，讀到馮鍾璞（宗璞）、陳澂萊譯的繆塞的詩，從此留下了印象，但出版於一九六〇年的《繆塞詩選》卻一直沒能買到。直到二〇一一年，才從孔網淘到一冊，原價六毛七的小書，現價一百二十大元。

十餘年前，讀鄧雲鄉的《文化古城舊事》（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版），第五章「中旅保姆」一節，談到陳綿其人，引起我的注意。陳綿，字伯早，福建閩侯人，其父爲清末郵傳部尚書。陳綿早年畢業於北大，後赴法留學，入巴黎大學藝術學院攻讀戲劇導演，獲藝術博士。回國後曾任中國旅行劇團導演，又到中法大學、北京大學任教。據鄧雲鄉回憶，陳在家中與太太、女兒（鄧文沒說清楚是與哪位太太哪位女兒，因爲他有兩位太太，兩位女兒）都講法語，與法籍的二太太吵架，更是滿口法語。他的大女兒陳徵（原文如此）萊，女師大法語系畢業，解放後在文藝大樓作法文翻譯，《可尊敬的妓女》就是她翻的，可是遭遇不幸，也早死了。據鄧語焉不詳的暗示，陳綿北京淪陷期間雖被日本人抓過兩次，但也有「落水」之嫌，不但在五六十年代其罪難綰，就是在傅斯年看來，也在該攆出北大之列。鄧文最後說，解放後，陳在外國語學院作法文教授，以「齊放」爲筆名寫點小文章，文化大革命一關，未過去，整死了。云云。《文化古城舊事》一書校勘不精，作者行文也每見粗疏之處，人名常有訛誤，如說齊放只寫點小文章便不確。據我的檢索，陳綿以筆名齊放在一九四九年後出的書（包括與他人合譯），達十冊之多，這應該不是小文章吧。

讀畢鄧文，我查了《中國翻譯家詞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一九八八年版）。該詞典的陳綿條沒註明卒年，也不曾拈出他的「落水」經歷。而與陳綿同時的著名翻譯家錢稻孫（曾任僞北大文學院院長、校長），詞典同樣不曾拈出其「落水」經歷，有說錢已不作漢奸看待，則陳綿更不屬漢奸，此說然否，不得而知，姑錄以備查考。

說來也巧，近日讀了一冊《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中國和平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張泉著），在第五章第四節「古城文學家」中，又讀到了與陳綿有關的文字。首先，該書註明陳綿歿於一九六六年（錢稻孫同歿於一年，張泉誤將錢歿定爲一九六二年，對於文革的過來人，歿於一九六六年意味着什麼，大概與蘇聯時代的歿於一九三七年相近）。繼而，作者寫道，「一九四二年九月偽華北作家協會成立時，他又以國立藝專教授的身份擔任評議員。次年八月，作爲華北的代表前往東京出席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並在會上表示，他深受大會熱烈情緒的鼓舞，準備絞盡腦汁盡文人的責任。」顯然，陳綿的這些言行，都令他在以後的歲月中吃不了兜着走，而且累及後人。鄧雲鄉說的到外國語學院任教，我想就是讓他換個名字有地方譯書餬口，用當時的說法就是養起來，課是上不了的，陳綿之於齊放，猶周作人之於周啓明。他們中間，只有錢稻孫是例外，譯作署的還是自己的大名，當局聽之任之，這裡有些什麼蹊蹺，同樣不得而知。

最後，應該談到陳澂萊的合作者宗璞的回憶。關於陳澂萊，宗璞曾寫過兩篇散文，那是收集在《鐵簫人語》（青風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中的《水仙辭》和《三幅畫》。宗文對合作者的出身不置一詞，也就是說，她或者不知陳父其人，或者不想提。鑒於當年政治第一的氛圍，似陳這樣「顯赫」的家世，同機關的人是很少不知道的，看來還是以後者居多。下面是宗文的節錄：「我們曾一起翻譯《繆塞詩選》，其實是她翻譯，我只潤飾文字而已。」但合作者的翻譯觀南轅北轍，用宗璞的話來說，「我嫌她太拘泥，她嫌我太自由，……我說譯詩不能太認眞，因為詩本不能譯。她說詩人就是認眞的，譯詩的人更要認眞。」儘管宗璞當過多年的《世界文學》編輯，也算是翻譯界的老前輩，但我還是要說，斯言謬矣！陳澂萊是對的，我當引以爲同道，雖然天分、訓練有高低優劣之別，譯詩這一試驗本來成功的希望就不大，但認眞兩字必不可少。

宗璞最後寫道，「澂萊於一九七一年元旦在寒冷的井中直落九泉之下，迄今不明原由。我曾為她寫了一篇《水仙辭》的小文。現在誰也記不得她了，連我都記不準那恐怖的日子。」又說，「她也是太脆弱，只是心底的那一點固執，是無與倫比了。因為固執到不能扭曲，便只有折斷。」作家以詩筆爲文，一唱三嘆，自有自己的剪裁取捨之道，不能面面俱到乃事所固然，但我還是要說，她太吝惜筆墨了。

兩代翻譯家的遭遇，我斷斷續續讀了四十多年才讀出了一個梗概。也許有人早已爲文加以揭櫫，只是我一直懵然無知而已。陳綿距我太過遙遠，我只能表示惋惜；但曾幾何時，陳澂萊式的人物就近在眼前，她譯的兩行繆塞的詩：「當痛苦、流亡和無窮的歲月，／迫使這顆絕望的心枯萎。」竟一語成讖，聞者寧不發爲浩嘆？

民族工業最初的「魂」

流沙

文化經緯

經常開車經過錢塘江大橋，橋上車水馬龍，橋底江水滔滔。今年九月，錢塘江大橋迎來了七十五周歲。許多網友驚嘆，大橋竟然爲大家服務了七十五年，而且現在每天仍有一萬多輛汽車、一百二十多列火車從橋上經過，看來再爲杭州人服務二十五年，成爲「百歲老人」完全有可能。

錢塘江大橋的「牢不可摧」堪稱奇迹，在抗戰、解放戰爭年代，大橋幾次被炸，都沒有倒下。橋樑專家說，要炸毀大橋沒那麼容易，如果炸藥沒放對地方，爆炸最多帶來一點皮外傷。

對於杭州來說，錢塘江大橋是次於西湖、三潭印月之外的一個城市標識，前者在於人文，後者還是在於人文。前者的「人文」是基於風光、文化的綜合，而後者的「人文」基於的是科學、工業的綜合。

當各地頻頻出現「樓歪歪」、「橋倒倒」的當下，那當年只憑藉人工建造起來的錢塘江大橋，眞的是一位「獨孤求敗」的老人了。

現在許多人關注國貨、民族工業，嘆它們的不爭氣。懷念幾十年的「國民床單」的質量，懷念永久、鳳凰牌自行車的經久耐用，還懷念回力鞋的價廉物美……爲什麼我們現在製造不出這樣的「經典」，不是因爲生產技術在倒退，而是誠信在倒退。

如果追溯近代民族工業的發軔，無法迴避晚清的洋務運動，也無法迴避工程技術的「西風東漸」，以及伴隨着科學技術引入國門的「嚴謹、科學、誠信」，不惟官，不惟權的現代文明理念。

就有專家稱，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軔是極具「國際範」的，沒有經過「商業化洗禮」的士子，血液裡流淌着的是傳統道德的血液，懷着的是報國的夢想，他們一旦掌握了當時西方先進的科技，就會處處留下經典和傳奇。

曾在美國求學的茅以升建造錢塘江大橋，就是鮮活一例。

在中國，無人不知詹天佑。小時候的課本上說，詹天佑設計建造中國的首條鐵路——京張鐵路，是因爲他有志氣。在地形如此複雜的地區，連掌握核心工程技術的洋人也覺得有難度的時候，僅靠志氣是修不好鐵路的，要在河裡架橋、要穿山洞，要在峭壁上闢路，志氣幫不了大忙，靠的是嚴謹的科學態度。詹天佑是晚清一百二十名赴美留學的學子之一，他們是曾國藩、李鴻章等洋務派歷史功績中的一個亮點。這一百二十名留學生學成回國後有的成了大臣，有的成了專家。

「工程就是良心和誠信」這句話現在時時被提及。百年前的工程技術與如今相比，已有天塹之別。我們造出了那麼多的豆腐渣工程，而詹天佑的那個時代，僅靠人工，就給我們留下了經典。現在京張鐵路八達嶺段仍在使用之中，每天有列車轟隆隆駛過。讓我們知道什麼叫「百年工程」。這眞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良心誠信問題。

要成事，先做人。不行「人」道，難成大事。詹天佑十多歲來到美國，按照晚清朝的規定，需「寄養」在美國人普通家庭中教養，當時美國許多家庭報名要求「收留」這些中國孩子。詹天佑就住在善良的諾索布夫人家裡。詹天佑回國後，他與諾索布夫人通信不斷，噓寒問暖，感恩當年她的幫助和教育。

詹天佑的誠樸、篤信和感恩，讓諾索布夫人非常感動，那些信件作爲家庭遺產，一直由後代保存着，成爲她們家族最爲溫暖的記憶。

君子不修德，難以成諸事。

民族工業之振興，現在恐怕不缺技術，缺的是像詹天佑、茅以升身上的那種「愈久而彌新」的傳統道德觀念，以「誠」與「信」爲人處世，以「誠」與「信」鑄造工程。

本來，這是我們民族工業最初的「魂」。

旖弄蝶

黃康華攝

番薯花開

梁惠娣

飲食男女

周末，驅車回鄉下，遇到了開滿田園的番薯花。

車子在公路上疾馳，車窗外是一個又一個村莊與圍繞着村莊的田野。展目望向廣袤的田野，突然發現田野上一畦又一畦的農田上開滿了粉紫色的花兒，開成粉紫夢幻的一片，風景撩人。禁不住下車步行，走近田園才知道，那是番薯花呀！

此時的番薯地裡，番薯葉是墨綠色的，有的甚至是赭黃，像舊得掉色的暗淡外套，顯得毫不起眼。而那一朵朵淺紫的小花，就靜靜地開在墨綠墨綠的薯葉間。那花兒像牽牛花，但要比一般的牽牛花小上一圈，花朵呈粉紫色，花瓣向外顏色漸漸轉淡，花心呈玫瑰紫，花蕊是黃色的，看起來非常漂亮。那番薯花兒，像小孩嬌俏的笑臉，迎着太陽仰着頭，又像一個個小喇叭，在晨風中吹響。無數花兒開遍整個田野，開成一片花海，繁盛，夢幻，觸動人心的美，讓人如墜夢境。整個番薯花開的田野，彷彿一塊巨大無比的碎花棉布，晾曬於大地上，那俏麗雅致的花色惹起了我的剪裁慾望，我心裡想，用這塊棉布裁一件旗袍或者長裙，穿在身上肯定風情旖旎，非常好看。

面前嬌俏的番薯花勾起了我那塵封在歲月深處的記憶。小時候，我在家鄉那個靜謐的小村莊裡生活，每天上學、放學的時候，要走過一條田間道路，道路兩旁的番薯地裡，番薯花盛開，或淡紫，或乳白，或粉紅，平添了番薯地的嫵媚。那是一種單純活潑的美。那時我總會停下腳步，摘幾朵番薯花，或插在髮間，或拿在手裡揮舞，然後快樂地蹦蹦跳跳，那時的心情，因了幾朵盛開的番薯花而充滿了歡欣。

詩詞中，古今中外的詩人都愛詠花，而唯獨鮮見吟詠番薯花的詩詞，這不能不算是一種遺憾。倒是民國年間福建南安人吳增的《番薯雜詠》詩集裡，能覓到一首讚美番薯花的詩：「一樣花開小錦葵，儂家籐本較人肥。剪籐鄰女未曾到，但見花間蝴蝶飛。」詩人在地裡剪番薯籐，看到成群結隊的蝴蝶圍繞着喇叭形紫紅色的薯花蹁躚起舞，禁不住詩情大發而作了這首詩，詩中流露了詩人喜愛薯花、讚美薯花的感情。

在這個北風漸寒的季節，在田野中行走，見到開遍田園的番薯花，惹人情思無限，滿園旖旎間，盡是馨香詩意。

和平飯店……

阿爾

文化什錦

和平新村、和平飯店、大橋下面

剛住進和平新村的時候，總有點彆扭。爲啥？這小區的名字，和平新村。我理解，凡是叫和平的，心裡其實是在發虛，和平是一種嚮往，你說是願望也行。和平的反義詞是戰爭。你說這小區爲啥叫和平新村，還是新村，以前的舊村呢？估計是被戰爭埋葬了。要不，就是希望天下太平，不再有戰爭。

囉嗦這多，我這是廢話多多。沒話找話。在和平新村住下了，也就忘了去找這小區歷史的事了。說白了，也是無心去找，閒着多好。我這會沒事就想起那部周潤發主演的電影《和平飯店》，這名字比和平新村要好，吃喝拉撒，吃是首位的，飯店比新村好。在和平新村住，有時餓了想吃點什麼，房間裡卻啥都沒有，那個糟心啊，眞是無法向蒼天訴說。要不，開小賣部的，都有在深夜被人叫醒買方便麵的經歷呢。還是住和平飯店好啊。

再說住，中國內地房價現在貴得驚人，買套房不知得攢錢到什麼時候。這時我想起美國的搖滾樂隊「乾紅辣椒」的主唱，發跡之前住在大橋下面，後來走紅也是因爲那張《大橋下面》的專輯。還有美國涅槃樂隊主唱柯本，離家出走後也經常住在大橋下面，據說現在那橋下還有他寫的歌詞和即興畫作呢。寫到這裡，我琢磨着，中國好像還沒有搖滾樂手有住過大橋下面的經歷吧。

其實我沒想說什麼，但不知怎麼就從和平新村繞到了和平飯店，然後就到了大橋下面。看來住在和平新村就有這點好處，瞎繞。之後可以從靠正街的那個被弄彎的鐵大門的門縫裡鑽進去。那裡是片草地，不太大，沒有什麼樂隊住着，早晨的時候，會有幾個老頭乾吼幾句秦腔。

夜深人靜

多年以前在和平新村，我的睡眠從來都是從凌晨二點或三點開始。將近七十平方米的房子，好像很大。也就睡得不太安穩。總覺得有時候突然一扇門就會自動打開。有什麼事會發生呢？這麼想着就迷糊入睡了。然後猛地被不知是出租車還是什麼夜行貨車的引擎發動的巨大聲音驚醒。或者樓下幾個酒鬼在親密地談心和吹牛，他們談論的隱秘話題被我聽見，之後馬上忘卻。或者是女人罵街的喊叫，車窗玻璃被砸碎「嘭」的一聲，估計是出租車拒載酒鬼之後產生的「直接反應」。在這時，我有時會想念一個詞「夜深人靜。」可是在和平新村，想體驗這個詞是非常奢侈的。

夜深人靜，多麼好。於是，在和平新村的夜晚，我打開窗子，夏天的小涼風溫軟地吹進來，我把電腦打開，還有那對小音箱，繼而是古琴大師李祥霆的唱片《宋人詞義》和《唐人詩意》，緩緩流淌於不大的空間。記得剛到和平新村的那些日子，愛聽的是暴力反對機器樂隊的生猛之歌，還有佩蒂史密斯的《馬群》，還有李胡克的布魯斯，聽的比較雜亂。讀的書就更多更亂了。有陣子竟然翻看起關於楚國的考古報告起來，不知是想做什麼。好在有看不完的《米沃什詞典》，有剛拿出來看的胡寬詩集。還好古琴之韻，風雅在不足十平米的書房兼卧室裡，夜深人靜，它陪着我，在鍵盤的運動裡寫下一些分行文字和胡亂塗抹的心情。

（銀川筆記之五）

去唐山

李卉

天南地北

對於唐山，我總有種複雜的情結。

早年在天津工作，唐山近在咫尺，卻總沒有走進這座城市。這次去北京探親，加上唐山朋友的邀請，便成行了。北京到唐山只有一百多公里，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唐山就呈現在我們眼前了。彷彿夢境一般，將多年來我對這座城市的想像，一點點現實地展現在我眼前。

寬闊的道路，整齊的樓房，穿梭的車流，現代的商業，步履從容的行人，一切似乎那麼熟悉，又那麼陌生。有誰看出，就在這裡，三十多年前的一個夏夜，一場罕見的災難，像一把利劍，深深刺向唐山，大地劇烈震顫，城市一片廢墟，唐山，成了一座人間地獄，一座二十四萬人頃刻消失、七千多個家庭絕戶的悲慘城市。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我還是個孩童，卻倔強地記住了唐山地震後波及到我們這個城市的恐慌。這座城市，從小就以一種痛楚烙記在我的心中，三十多年過去了，但對於這座城市的記掛，對於劫後唐山人的生活，都傾注了我的想像，更多的是關注和繫牽。這麼多年來，一提及唐山，我的心情就莫名複雜起來，除了心痛，還是心痛。但眼前的唐山，卻是一座鮮活的年輕城市。人們衣着光艷，表情沉靜。太陽暖暖的，大釗公園裡大片的銀杏樹落葉，金黃一片。抗震紀念館廣場上，嬉鬧的孩童風一般跑過，繞着紀念塔一圈，又飛奔着鑽進了遊樂園，傳來一陣陣風鈴般的笑聲。

我們沒有時間去看唐山遵化的清東陵，也沒有情致去探幽大成山，我還是請唐山的朋友帶我們去看看地震遺址公園，去看看抗震紀念館，我想探尋和感受的還是那場地震如今遺留的點點滴滴。

在唐山市中心的「唐山抗震紀念館」是一座圓形的宏大建築，如今成爲到唐山的外地人必去的地方。館內參觀者衆多，大家靜靜聆聽講解員介紹，神情凝重，除了唏噓的感嘆，沒有一絲喧嘩。出紀念館便是抗震廣場，廣場的東頭是巨大的抗震紀念碑，猶如四隻通天巨臂堅韌地矗立在那裡。

河北聯合大學內的唐山大地震遺址，已經成爲了文物保護單位，巨大的圖書館大樓，如今成爲了殘垣斷壁，站在廢墟前，我們彷彿感受到了大地劇烈震動。廢墟遺址上，幾隻貓咪慵懶地曬着太陽。校園裡學生步履匆匆，極少投入遺址一眼，只有我們一行人，虔誠地站在遺址前，心難撫平。

經過災難的唐山人說起那場地震，說起一切和生命有關的話題，都異常平靜。他們經歷了生與死，經歷了親人的生死離別，他們更懂得生的美好。唐山的朋友說，他們喜歡叫如今的唐山爲新唐山，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在廢墟上不屈成長的新唐山。

據說劫後的唐山離婚率很低，夫妻彼此包容和扶持。社會上，人人和睦互助。歷經劫難的唐山人，才眞正懂得活着的珍貴，才眞正懂得一切功名利祿，在災難面前都顯得那麼卑微，不堪一擊……

出唐山的時候，正好碰到一結婚的車隊。我想，新唐山又新增一對幸福的新人，新添一個嶄新的小家了。我從心裡祝福這對新人，同樣祝福我喜歡的新唐山。